

岭南博士文库

近代商会与地方金融

——以汕头为中心的研究

陈海忠 著

 广东优秀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广东省出版集团
广东人民出版社



岭南博士文库

近代商会与地方金融

——以汕头为中心的研究

陈海忠 著



广东优秀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广东省出版集团

广东人民出版社

· 广州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近代商会与地方金融：以汕头为中心的研究 / 陈海忠 著. —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1.5

(广东优秀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出版基金岭南博士文库)

ISBN 978 - 7 - 218 - 07176 - 3

I. ①近… II. ①陈… III. ①商会—商业史—研究—汕头市—近代
②地方金融—经济史—研究—汕头市—近代 IV. ①F729.5
②F832.9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10751 号

近代商会与地方金融

——以汕头为中心的研究 陈海忠 著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出 版 人：金炳亮

责任编辑：卢雪华 陈启方

装帧设计：张力平

责任技编：周 杰

出版发行：广东人民出版社

地 址：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10 号（邮政编码：510102）

电 话：(020) 83798714（总编室）

传 真：(020) 83780199

网 址：<http://www.gdpph.com>

印 刷：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书 号：ISBN 978 - 7 - 218 - 07176 - 3

开 本：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24.75 插 页：2 字 数：297 千字

版 次：2011 年 5 月第 1 版 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55.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 (020 - 83795749) 联系调换。

售书热线：(020) 83790604 83791487 邮购：(020) 83781421

目 录

绪论	1
一、近三十年来的商会史研究	1
二、研究的对象	4
三、研究的定位	12
四、资料来源	13
五、各章节安排及主要内容	16
 第一章 贸易与城市的崛起	19
第一节 潮商的海上贸易与汕头的开埠 ...	19
第二节 近代汕头的经济网络	34
 第二章 汕头的商人组织：从会馆到商会 ...	83
第一节 万年丰会馆、保商局与商会	83
第二节 民国初期的汕头商会	108
第三节 近代汕头会馆、商会的组织形态 及运作	127
 第三章 七兑票、“废两改元”与总商会	140
第一节 汕头的七兑票	141
第二节 汕头总商会与 1925 年 “废两改元”	165

第四章	商会与汕头保证纸币制度	198
第一节	汕头保证纸币	198
第二节	金融风潮与保证纸币制度的终结 ...	220
第三节	市商会与倒闭银庄纸币的清理	252
第五章	市商会与商库证	272
第一节	商库证的发行和行使	272
第二节	市商会、商库证发行委员会和 监察员	280
第三节	商库证的收回	291
第六章	20 世纪 30 年代的政府、商会与 商人	300
第一节	1934—1935 年商号与市商会的 诉讼	300
第二节	金融风潮中的商会改选风波	317
结 语		338
参考文献		346
附录		366
后记		388

图表目录

图 1-1	潮梅地区简图	37
图 1-2	1875—1932 年汕头进出口总额趋势	56
图 1-3	近代汕头经济网络示意图	71
图 5-1	增派监察员前各方关系示意图	289
图 5-2	增派监察员后各方关系示意图	290
表 1-1	1904—1939 年部分年份汕头市人口约数表	29
表 1-2	汕头各主要马路通车时间	33
表 1-3	民国元年至十七年常关出入口之民船数	38
表 1-4	1863—1864 年德忌利士汽船公司来往汕头 航海表	41
表 1-5	汕头轮船放行日期(民国元年九月廿二日)	47
表 1-6	1928 年汕头主要外洋航线及航期	48
表 1-7	1864—1938 年汕头口岸进出口货物价值 统计表	52
表 1-8	1936 年汕头市各类同业公会情况表	60
表 1-9	1904—1934 年汕头口岸出国回国人数表	62
表 1-10	1884—1928 年汕头与国内各通商口岸来往 旅客数	65
表 1-11	汕头商埠批局每年经汇总数表	67
表 1-12	1917—1919 年汕头入超额与侨汇总额比较表	68
表 1-13	1904—1905 年汕头银庄名录	74
表 1-14	农工商部登记注册的汕头庄号	75
表 1-15	潮汕民信局之调查(1929 年)	78
表 2-1	第一、二届汕头市商会常务执行委员所属 公会及籍贯表	126

表 2-2	汕头 1904—1946 年历届商会领导人 情况表	133
表 3-1	1896—1905 年汕头口岸进出口金、银及铜币 价值统计表	149
表 3-2	民国时期自沪运银至汕损益比较表	171
表 3-3	1923 年 1 月至 1926 年 6 月汕沪银元流动表	172
表 4-1	1929 年汕头发行纸币的银庄及其司理人	201
表 4-2	1933 年汕头银庄保证纸币一览表	202
表 4-3	1929—1932 年汕头输往南洋几种商品出口 情况表	232
表 4-4	1935 年清理各倒闭银庄保证产业情况表	260
表 4-5	汕头市商会变卖各倒闭庄号保证产业收支 款项清册	262
表 5-1	汕头市商库证发行委员会委员名录	281
表 6-1	1936 年当选的市商会执、监委员候圈人及 圈定结果	322
表 6-2	1936 年省政府圈定后的汕头市商会组成 人员	324



绪 论

一、近三十年来的商会史研究

商会是中国近代一个重要的社会组织，其在近代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较早前就备受国外学者的关注。国内由于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原因，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以前，学界对此少有研究。80 年代以后，中国商会史研究有了很大的发展，在史料的发掘、理论探讨、方法创新和研究深度上都取得骄人成绩，使我们对近代商会的性质、特征、职能、作用和地位等都有了较清晰的认识。概而言之，近 30 年中国商会史研究归纳起来有以下几方面的特点：

1. 从研究对象看，早期研究者主要关注上海、天津、苏州三地的商会，随着研究队伍的扩大，研究对象逐渐扩展到全国以及海外华商商会，一些小城镇商会也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直隶、四川、山西、山东、广西、新疆等省，贵阳、南昌、无锡、吴城、吴县、杭州、高阳、武汉、沈阳、梧州、济南、成都、广州、汕头、苏中地区等地的商会都有学者做过研究，进入学者研究视野的还有澳大利亚乌修威雪梨中华商会、新加坡中华总商会、日本阪神华商商会、香港总商会等华人商会组织。

2. 从研究的时限看，初期主要集中于晚清民初的商会，

逐渐贯穿整个中国近现代史，并延伸到了当代。当代商会正越来越多地受到学者的关注并已取得了初步的研究成果^①。

3. 从研究的主题看，研究者大多在考察“资产阶级”、“民族资本家”、“现代化”、“市民社会”或“公共领域”等范畴下，对近代商会进行研究。从内容上看主要有：（1）某一城市的商会发展史，代表作有徐鼎新、钱小明的《上海总商会史：1902—1929》^②。（2）商会与辛亥革命、资产阶级等。（3）商会产生的历史背景及其职能、性质、网络、选举等。（4）商会与政府的关系（包括商人的政治参与、商民运动等）。（5）商会与经济、社会、教育及法律等。^③

近年来商会史研究也存在一些问题。冯筱才就认为，

① 如浦文昌等：《市场经济与民间商会——培育发展民间商会的比较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3 年版。陈剩勇、汪锦军、马斌：《组织化、自主治理与民主：浙江温州民间商会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 年版。郁建兴、黄红华、方立明：《在政府与企业之间——以温州商会为研究对象》，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郁建兴、王诗宗、黄红华、李建琴：《民间商会与地方政府——基于浙江省温州市的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6 年版。金晓晨：《商会与行业协会法律制度研究》，气象出版社 2003 年版。黄孟复主编：《中国商会发展报告 No. 1》，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 年版。张铁军、景君学、杨国昌：《当代中国商会研究》，甘肃文化出版社 2006 年版。黄孟复主编：《中国商会发展报告 No. 2》，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8 年版。

②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1 年版。

③ 关于商会史研究对象的区域和研究主题、倾向等问题，已经有不少学者做了很有见地的学术综述。可参阅朱英：《清末商会研究述评》，《史学月刊》1984 年第 2 期。徐鼎新：《中国商会研究综述》，《历史研究》1986 年第 4 期。虞和平：《近八年之商会史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5 年第 4 期。应莉雅：《近十年来国内商会史研究的突破与反思》，《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4 年第 3 期。冯筱才：《1911—1927 年的中国商人与政治：文献批评与理论构建》，《浙江社会科学》2001 年第 6 期；《中国商会史研究之回顾与反思》，《历史研究》2001 年第 5 期；《最近商会史研究之刍见》，《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6 年第 5 期。



“有影响力的公开出版的商会史著作及发表的论文越来越少，有关的研究者对一些热点问题的讨论也比较难以介入。这一方面是由于其他新型的研究领域正在崛起；另一方面也与商会史研究面临的一些‘瓶颈’有关系”。^①所谓研究的“瓶颈”问题，即是丰富多彩的历史被不同的研究者自觉或不自觉地装进了前人早期构建起来的框架之中，使商会史研究出现学术成果同质化的现象。因此，商会史研究必须寻求突破和创新。一些学者对此已经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并提出不少真知灼见。马敏认为，商会史研究需要实现从政治史范式、现代化范式、“市民社会”范式向指向新社会史为标志的“总体史”转移，走出商会，走向“总体史”^②。应莉雅也提出了商会史研究的一些有待开拓的领域，如以区域经济分析法研究商会、商会的地域性特征、商会与区域内资源结构和特点的关系等等。^③朱英认为，中国商会史研究的新突破，需要在理论和方法上继续创新，注重解决理论阐释与实际论述相脱节的情况，需要重视研究时段的延长与视野的拓宽，加强对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地区的商会，特别是县镇基层商会的实证性深入研究，对与商会直接相关的一些商人社团也应进行深入探讨。^④

总之，商会史的研究仅仅是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一个主题，如果仅就商会而研究商会，商会史的研究必将走入死胡同，近30年来的研究实践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① 冯筱才：《最近商会史研究之刍见》，《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

② 马敏：《商会史研究与新史学的范式转换》，《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

③ 应莉雅：《近十年来国内商会史研究的突破与反思》，《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3期。

④ 朱英：《中国商会史研究如何取得新突破》，《浙江学刊》2005年第6期。



二、研究的对象

选择某个特定的历史对象进行研究，反映的是研究者内心深处的某些关怀，要么通过研究来回答一些历史问题，以期对历史有更客观的认识；要么透过对历史轨迹的描述，探求其中的内在逻辑或者规律，回答一些与现实相关的问题，以期更加深刻地理解现实。

本书以汕头商会和金融作为研究对象。研究对象的确立，除了以商会研究的学术史为大背景外，还主要基于以下三方面的考虑：

（一）关于近代广东商人、商会的研究还很薄弱

广东是近代中国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起源地或中心区域，如鸦片战争、辛亥革命、护法运动、护国运动、第一次国共合作等。广东商人及商人组织拥有雄厚的经济力量，不仅是地方社会权力格局中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而且对全国乃至境外地区都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力。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有一批学者对广东商人、商会进行了深入研究，并产生一批较高水平的学术成果。这些研究有的出自德高望重的前辈，有的出自年轻学者，研究主题因时代不同各有所侧重，研究旨趣和运用的理论工具也各不相同，总体上勾勒出近代广东商人、商人组织的活动轮廓。^① 其中有较大影响力的主要有邱捷的《辛亥革命时期的

^① 还有一批年轻学者完成与此有关的学位论文，如陈景熙的《官方、商会、金融行会与地方货币控制权——以 1925 年“废两改元”前后的汕头为例》（汕头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2 年），乔兆红的《1920 年代的商民协会与商民运动》（中山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3 年），杨茂玲的《战后广州市商会研究（1946—1949）》（暨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 年），马木池的《国民政府控制下商人的分化与冲突——1924—1934 年间广州商会整合之背后》（中山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 年）。



粤商自治会》^①、《广州商团与商团事变——从商人团体角度的再探讨》^②、《近代广东商人与广东早期现代化》^③、《清末广州的“七十二行”》^④；温小鸿的《省港罢工与广东商人》^⑤；Stephanie Po-yin Chung（钟宝贤）的 *Chinese Business Group in HongKong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South China, 1900—25*（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INC. 1998）；敖光旭的《“商人政府”之梦——广东商团及“大商团主义”的历史考查》^⑥。当然，与上海、苏州、天津等地区的研究比较，广东地区的研究明显滞后，还有诸多值得深入探讨的地方。

改革开放以后，广东省各种行业协会及商会得到迅速发展，可以说这是中国近代商会在今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复兴，具有不可忽视的历史意义。2006年2月，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人民政府就联合下发了《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发挥行业协会商会作用的决定》的文件，要求加强对如何发挥行业协会、商会作用的问题进行研究。

（二）商会与政权关系的研究尚待进一步深化

综观近30年来中国商会史研究的各项成果，其背后“关怀”的大部分都不只是商会本身，而且是通过商会的研究，有的是考察中国近代的“资产阶级”、“民族资本家”的问题，有的是考察“中国早期现代化”的问题，有的则是考察所谓的中国近代“市民社会”或“公共领域”等范畴的问题，这也跟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近代史研究潮流基本同步。以上大部分的研究所关注的都有一个共性的问

① 《近代史研究》1982年第3期。

② 《历史研究》2002年第2期。

③ 《广东社会科学》2002年第2期。

④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

⑤ 《广东社会科学》1987年第1期。

⑥ 《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4期。



题，即商会与国家政权的关系，而这个问题也可引申为商人与政权的关系。

早期研究者在研究商人、商会与政治的时候，大都通过商会来考察中国资产阶级及其中的民族资产阶级的相关问题，进而分析政治运动的阶级基础，把商人划入买办阶级或民族资产阶级的范畴，认为阶级属性决定了政治立场，并分析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妥协性和两面性。如王笛较早地探讨了商会与政府的关系，认为清末商会与政府间的合作与依赖多于对立与斗争。^① 胡光明甚至认为天津总商会在一些重要问题上真正成为了军阀政权暴敛民财的工具。^② 小科布尔（Parks M. Coble）认为在 1927—1937 年，上海资产阶级在国民政府的控制下，其原有的地位作用影响急剧下降，完全处于附庸状态。^③ 徐鼎新等也认为在整个国民党统治时期，商会与政府之间的法律关系名存实亡，商会完全处于屈从政府意志的附属地位。^④

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之后，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对商会的政治参与、商会与政府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新的探索，认识到商会的政治参与及与政府的关系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地域空间中会表现出差异性，如强调商会与政府间的既合作又不断冲突的关系。虞和平就提出中国近代商会与政府的实际关系主要是超法的控制与反控制关系；^⑤ 马敏、朱英

① 王笛：《试论清末商会的设立与官商关系》，《史学月刊》1987 年第 4 期。

② 胡光明：《论北洋时期天津商会的发展与演变》，《近代史研究》1989 年第 5 期。

③ [美] 小科布尔（Parks M. Coble）著，蔡静仪译：《江浙财阀与国民政府（1927—1937）》，南开大学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26 页。

④ 徐鼎新、钱小明：《上海总商会史：1902—1929》，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400 页。

⑤ 参阅虞和平：《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



在对晚清苏州商会个案研究中，认为近代中国市民社会的雏形在很大程度上存在着对国家的特殊依赖性，其建成的初衷是为了调协官民关系而非与国家权力对抗；^① 张志东则认为要关注商会与政府间在大量的日常的具体事务中的合作与冲突；^② 郑成林就认为经过整顿后的商会力量的确有所削弱，但并非完全失去独立性，在民主抗日活动中，商会仍是一个具有明显独立人格的商人团体；^③ 冯筱才则在同一区域不同时期在革命、民族主义运动、战争三类事件中分析商人与政治的关系，认为商人与政治的关系有常态和变态之别，两者的切换取决于商人的私有产权问题，所有的政治表现取决于商人对利益最大化或者损失最小化的考虑。^④ 朱英从商会内部运行的角度考察了天津商会，认为南京国民政府初期天津商会遭遇的困局不能简单归因于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打压民间社团，而应从当时天津工商业发展困难以及商会自身寻求原因。^⑤ 朱英与冯筱才的研究对于深化近代商会史研究，具有较大的启发意义。

整体上学者们基本认同近代商会通过特定的政治、经济活动，促进了经济的发展、社会和文化事业的进步。在晚清至民国初年，商会在政治、经济上具有较强的相对独立性，能够发挥重要的作用。但在国民党掌握了全国政权之后，不断加强社会控制，国家权力加速向基层社会渗透，

① 参阅马敏、朱英：《传统与近代的二重变奏：晚清苏州商会个案研究》，巴蜀书社1993年版。

② 张志东：《近代中国商会与政府关系的研究：角度、模式与问题的再探讨》，《天津社会科学》1998年第6期。

③ 郑成林：《九一八事变后上海市商会的民主抗日动向》，《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4期。

④ 参阅冯筱才：《在商言商：政治变局中的江浙商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

⑤ 朱英：《南京国民政府初期天津商会的改选及其困境》，《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



商会逐渐丧失了其独立地位。然而，国家权力是怎样渗透到地方社会的？国民党在取得全国政权之后，对地方社会的控制力仍然很薄弱，它是通过怎样的途径逐步在地方构建国家权力的？商会又怎样去应对这一新的形势，是怎样逐渐失去其独立性，以及在地方社会中的地位是怎样被削弱的？现有的研究对这些问题论及者相对较少。而在此中间，尽管全国的趋势基本一致，但在这个过程中不同的地方也会展现出不同的风貌。

在考察商会这一历史对象时，应该承认除了商会共性特征之外，各地的商会也具有丰富多彩的个性特点，与各地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有很大的关系。毕竟，商会是中国的商会，也是某省某地的商会，它的设立、发展、变化是在国家甚至国际大环境和地方小环境交互作用的背景中发生的。朱英对五四时期上海、天津两个总商会的研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① 即使在同一省范围内，情况也有很大的不同，如近代广东的广州与汕头两个总商会，其成立的背景、与政权的关系、与本埠其他商人组织的关系、对经济的控制力度等方面，由于广州与汕头两地在历史文化背景、金融制度等方面的差异就表现出各自的特点。因此，如果能够把商会史与地方历史文化传统的变化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把商会作为透视地方社会的出发点，在社会发展的历史脉络中诠释商会的作用和地位，对于更加全面、深刻地理解近代商会会有很大的帮助。

（三）潮汕地区货币金融制度的变迁可以为考察商会与政权关系提供一个另外的视角

潮汕地区位于广东东部，东与福建接壤，南临大海。该地区工商业有着悠久的传统，特别是明清时期潮州海商

^① 朱英：《五四运动期间的天津总商会》，《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6期；《上海总商会与五四运动》，《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

的力量和规模已相当可观。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汕头开辟为通商口岸，逐步发展成为韩江流域最重要的转口贸易港口，成为粤东区域经济中心、广东第二大商埠。近代商业的发达，以及晚清重视发展商业的政策，使地方商人的社会地位有了较大的提高。在汕头埠，商人们组织了行会、商会，维护地方经济秩序，并承担了部分市政管理职能。商人组织在晚清和民国时期的地方社会事务中，特别是在经济、金融领域，拥有很大的话语权，拥有“可能为很多政府所羡慕的”、“一种执行自己意图的能力”。^① 黄挺考察了汕头市商会在1933—1934年金融危机中的表现，认为商会在处理金融危机、稳定市场秩序、维护商人权益方面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保护型经纪人”的作用。^② 这对本书的研究具有很大的启发，但是，在汕头保证纸币制度下，商会不但起到经纪人的作用，而且已经成为市场交易的担保人，更成为市场经济行为中的甲方或乙方。

在金融制度方面，汕头与广州习惯不同，前者使用大洋，而后者使用毫洋。而且在晚清期间，汕头的汇兑庄发行一种无实银兑现的纸币——七兑票，并成为汕头的通用货币，所有市面交易、订立契约都以七兑票为单位。在汇兑庄同业组织——也是汕头总商会的主要行档——汇兑公所的操作下，七兑票拥有坚挺的信用，其价值有时还超过大洋现银。进入民国以后，经济、政治和社会环境等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在1925年广州革命政府东征之前，不论哪一方政治势力占据汕头，七兑票制度均没有受到冲击。但是在1925年，广州革命政府强力取缔七兑票，实行“废

① 《潮海关十年报告》（1882—1891年），中国海关学会汕头海关小组、汕头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潮海关史料汇编》，1988年，第25页。

② 黄挺：《1933—1934年金融危机中的汕头商会》，《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3期。

两改元”，以大洋为本位，准许潮梅地区各银庄发行以不动产为保证的纸币——保证纸币。保证纸币制度废除了七兑票时期汇兑公所操控纸币的权力，但又确立了总商会在地方金融事务中的核心枢纽地位。直至1933—1934年汕头金融风潮期间，保证纸币制度随之破产，汕头市商会请求政府准予发行商库证以便接济，从此地方商人对地方金融事务的操控权逐渐被政府剥夺。

对于近代中国货币金融的研究，多数学者都从宏观的角度进行分析，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如在金融制度方面，杜恂诚认为由于政治的腐败和不稳定，政府对金融的干预力是有限的，金融业基本按市场的导向自主发展，以行业规则和不成文法来约束自己的行为。行业协会具有很强的经济力量和社会影响。在缺乏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协调的情况下，银钱两业的同业组织以其整体一致的立场对外交涉，使其在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并与其他经济力量保持平衡。^①他认为以1927年为界，中国近代经历了自由市场型和垄断型两种金融制度模式，二者在制度和功能特性的不同表现在于政府作用的大小、有无中央银行制度等多方面。^②对于中国传统的钱庄的研究，研究者大多关注山西票号与上海钱庄。^③朱荫贵考察了1927—1937年钱庄

① 杜恂诚：《一九二七年前中国金融的自由市场制度》，《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2000年第3期。

② 杜恂诚：《中国近代两种金融制度的比较》，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3期。

③ 如张正明：《晋商兴衰史》，山西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孔祥毅：《金融票号史论》，中国金融出版社2003年版。张桂萍：《试论山西票号的经营模式》，《晋阳学刊》2005年第4期；《山西票号的身股制度与人才管理》，《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5年第2期。石涛、张军：《上海钱庄汇划制度探析》，《人文杂志》2004年第2期。李耀华：《上海近代庄票的性质、数量与功能》，《财经研究》2005年2月。戴建兵：《上海钱庄庄票略说》，《档案与史学》2002年第2期。